

这群年轻人从古籍中寻找“心灵答案”

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戴 纳
记者 蒋肖斌

17岁的古籍爱好者王梓屹曾出过一个“笑话”：6月的桂林，他在阳光下晒一本自己收藏的古籍，并发到古籍爱好者交流群里，被人指责“暴殄天物”，他才明白，古籍要防受潮，更忌暴晒，晒过后书页会像树叶一样泛黄变脆。

王梓屹回忆，初二一堂美术课上，老师讲到桂林山水时，引用了清代罗辰所著的《芙蓉池馆诗草》卷上《桂林山水画稿》。看到家乡的风景在100多年前以木刻版面留存，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，暑期专门到桂林博物馆查看《桂林山水画稿》，由此开启了探寻古籍之路。

和王梓屹一样，很多年轻的古籍爱好者早就入了古籍的“坑”。有人喜欢触摸留存着岁月印记的纸张，于是收藏多种版本的古典原书；有人钻进时空的隧道里，甘坐“冷板凳”，挖掘古人的智慧。网络媒体和科学技术让古籍阅读变得方便，同好间的交流也多元便捷起来。那些藏在古籍中的岁月，又流淌进千年后年轻人的梦乡。

历史的风吹了千百年

小林是长沙岳麓书社的一名年轻编辑，工作两年，参与过两个古籍项目的编辑工作。她喜欢李商隐，虽然比他“年轻”约1190岁，但喜欢背诵他的诗句，模仿他的风格写作。

“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。”有一天午休，小林再次被同事的聒声吵醒时，想到了李商隐的这句诗。在她还是湖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时，老师就讲过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诗。老师说，这是一种“微弱的萌动”。此刻，在工位上，每当醒来，她就会觉得，“日子为什么又这么平淡地走



戴后飞的书架“芜狐斋”。

受访者供图

了半天”。她后知后觉这便是“微弱的萌动”，“是外界平静如冬日寂寥，一成不变，但你听到了内心企图生长的声音，你知道你不甘寂寞，不肯流俗，终有一天会打破寂寥”。

偶尔，她会对李商隐的诗句产生类似的联想解读，“可能李商隐自己也不是那么想的”。后人的无数种解读，勾勒出万千种李义山的形象，晚唐的风吹了千百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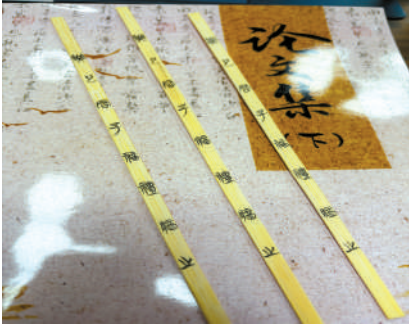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22岁、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孙路遥，接触古籍已有15年。《论语》是她的“答案之书”，“生活中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时，几乎只要随意翻开几页，就会发现孔子已经在2000多年前给出了答案”。孙路遥找到了阅读古籍的乐趣：“对于还很年轻的我们来说，阅读古籍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无限的人与社会，看到与自己相匹配的生命价值并尝试践行。”

本科期间，已有扎实古代汉语基础的

孙路遥，开始尝试学术和实践探索。通过参加学术论坛、参加古籍出版社的实习、组织传统文化读书会等方式，她初步思考了即将步入研究生阶段的方向：以中国经学史为核心，结合数字手段与海外视角，讲好传统文化的新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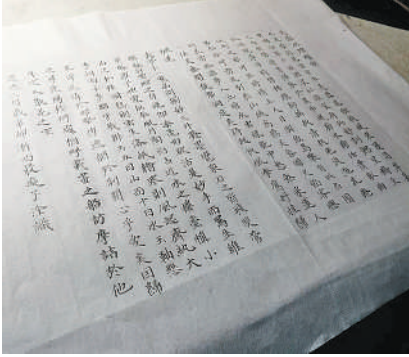
始于作品陷于人品，他为“偶像”曹植发论文

今年27岁的戴启飞从初中接触《三国演义》开始，就一头闯入了“建安风骨”的文人世界，尤其对曹植钦敬有加。为了深入了解这位被后世认为“多情任性”的公子，戴启飞迫切想要阅读曹植的诗文集。当时，县里的新华书店没有《曹植集》，店员辗转帮他订购到赵幼文的《曹植集校注》。他发现，曹植不但有“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”的才学，



查紫贤在自制竹简上写下楚文字“乐也君子，福礼将之”赠予朋友。

受访者供图



王梓屹抄书作品。

受访者供图

亦有“天性仁孝，发于自然”的性情，更有“戮力上国，流惠下民”的志向。

那是他第一次细读古籍原典，对曹植的热爱“始于作品，陷于人品”。现在，他是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博士生。

高中时，戴启飞就在网络社区找到很多喜欢曹植的同好。有人提出，《曹植集》已有几个权威注本，但还没有面向大众爱好者的白话译本（当时中国台湾地区已有相应的白话本，只是他们不知道——记者注）。于是，包括他在内的5名小伙伴作为骨干成员，与其他网友一道，决定在该社区此前的翻译旧稿的基础上，共同翻译《曹植集》。

历时数月，翻译完成，成果被命名为《曹植集全译》，只有翻译而没有注释，全书一共13.8万余字。虽然只作为网络作品流

□ 白鸿叶

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深褐色樟木柜中，静静躺着数千幅古地图。它们或绘于绢帛，或刻于石碑，或印于纸页，有的残缺斑驳，有的依然色彩鲜艳——这些被岁月封存的“历史切片”，不仅是地理信息的载体，更是中华文明的“立体档案”。

近日，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《天地之间：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》，以这些古地图为“钥匙”，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。从战国铜版到清代绢图，从“计里画方”到经纬度实测，书中50余幅经典古地图的“复活”，不仅让我们看到古人如何认知世界，更解开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创新。

古地图：被折叠的历史长卷

地图不是冰冷的工具，而是古人对世界的“回答”。这些看似静态的图形，实则是动态的历史记忆——它们记录了疆域的伸缩、技术的进步、文化的交融，甚至藏着古人的情感与想象。

战国中山国的铜版《兆域图》，是书中开篇的“主角”之一。1974年出土于河北平山的它，长94厘米、宽48厘米，表面因墓葬火烧而凹凸变形，却依然清晰可见用金银丝镶嵌的线条与铭文。“兆”即墓域，这是中山王为自己规划陵园的建筑蓝图。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建筑规划图，更是一套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。

比《兆域图》晚约400年的西汉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》，则展现了古人对“现实空间”的精确认知。这幅绘于绢帛的地图，长97厘米、宽93厘米，以1:18万的比例（约合汉代一寸折十里）描绘了长沙国南部的山川、城邑与道路。图中30余条河流的走向与现代卫星地图高度吻合，80

余个居民点以矩形（县城）和圆形（乡里）符号区分，20余条道路用虚实线标注。根据相关学者考证，图上所绘制的河流骨架、流向及主要的弯曲等，和今日的实际情况大体相似，这也证明《地形图》是一幅经过科学测量的地图。

如果说《兆域图》是“微观空间”的秩序、《马王堆地形图》是“区域空间”的写实，那么宋代《禹迹图》则开启了“宏观空间”的探索。现存于西安碑林的《禹迹图》石碑，刻于南宋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图以上“计里画方”法绘制了255个方格，每格“折地百里”，横70格、纵73格，覆盖了“九州”的核心区域。

“计里画方”相当于古代的“经纬网”，通过网格定位，让地图从“示意图”变为“实用图”。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评价它“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”。它的出现，更推动了后世《广舆图》等大型地图集的诞生。

明代《坤輿万国全图》的出现，是中国古地图上的一次“裂变”。这幅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，以椭圆投影法呈现全球，首次将“地圆说”“经纬度”引入中国。但它并非“西方中心”的复制——为了让中国读者接受，利玛窦调整了投影，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；山脉用青绿山水法绘制，河流以双曲线表现，与传统舆图风格一致。利玛窦知道，要让中国士大夫接受新的地理观，必须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与符号。这幅地图的彩绘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，虽仅存一条屏（亚洲部分），但



清代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分省图。
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

仍可见海洋用浅灰波纹填充，山脉以立体形态勾勒。它既是科学的，也是艺术的，更是跨文化对话的见证。

与《坤輿万国全图》的“开放”不同，清代《福建舆图》则以“宏大”诠释了“疆域主权”。这幅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绢本地图，长7.5米、宽7.5米，四周以黄缎镶边，绣有9条金龙，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单幅绢本地图。图中详细绘制了福建九府一州的疆界、城池、关隘，甚至台湾府的“诸罗县”“凤山县”也被清晰标注——“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台湾正式纳入福建管辖，这幅图正是为了记录这一历史时刻而绘制。”图中用红色单线标府界、绿色标

县界，道路以黄底红条纹表示，这种标准化的符号体系，说明清代已形成成熟的行政地图绘制规范。

地图里藏着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

古地图的绘制，从来不是单纯的“技术行为”。从符号选择到内容取舍，从命名逻辑到绘图风格，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古人的价值观与文化基因。

南宋黄裳为嘉王赵扩（后来的宋宁宗）绘制的“天地人三图”——《天文图》《地理图》《帝王绍运图》，是书中诠释“宇宙观”的典型案例。《天文图》刻于石碑，上半部分为星图，标注了1400余颗恒星，涵盖三垣二十八宿；下半部分为图说，系统讲解“天体圆、地体方”“日为德、月为刑”的哲学；《地理图》则绘制了宋代疆域，标注了400余处府州县，图跋中写道“中原土壤，北属幽燕，以长城为境旧矣”，暗含收复失地的期许；《帝王绍运图》以图表形式排列自黄帝起的帝王世系，评说盛衰之理。

三图并列，正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具象化表达：天有星象，地有山河，人有历史，三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宇宙秩序。这不仅知识的传递，更是价值观的灌输——嘉王后来成为宋宁宗，或许正是这些图激发了他“修德行政”的理想。

明代《山西镇总图》《宣府镇总图》等“边镇图”，则是“家国同构”的缩影。这些地图以形象画法绘制了九边重镇的边堡、关

隘与山川，山西镇的“宁武关”“雁门关”，宣府镇的“张家口堡”“独石城”等，均用醒目标注，旁注驻军人数、粮秣储备。边镇图不是普通地图，而是军事防御的“活档案”。《宣府镇总图》中“张家口堡”标注“朝往夕返”“远商辐辏”，既记录了军事功能，又反映了边贸的繁荣；这些地图不仅是防御工具，更强化了“守边即守家”的国家意识。

明代《河防一览图》则以“治河”诠释了家国情怀。这幅由治河专家潘季驯主持绘制的长卷，纵43厘米、横2010厘米，详细标注了黄河从星宿海到入海口的河道、堤坝与水患点，甚至记录了“束水冲沙”的治河策略。潘季驯4次治河，这幅图是他经验的总结。图中“祖陵图说”“皇陵图说”强调黄河对皇家陵寝的保护，但实际上治河不仅是民生工程，更是“护陵”“护国”的政治任务。图中大量标注的“民埝”“官堤”，则体现了“官民共守”的治理智慧——古人早已知晓，大河安则国家安。

中华文明的延续，还在于对“空间”的认知与守护

书中大量引用国图藏珍稀舆图，如世界最大绢本《福建舆图》、清代《云南全省舆图》（26册，含102幅分图）、明代《全海图注》（记录沿海卫所与倭寇防御）等。这些地图多为首次系统整理，部分甚至从未公开出版。例如，《云南全省舆图》分“全省总图”

人”。作为今年的高考生，他早早就确定了大学志愿范围：汉语言文学或历史学的相关专业，倾向于古文字研究。他畅想未来的工作：做一名图书管理员，或是与古籍相关的学者。

对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说，“访古”是他们的日常。今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的查紫贤在日出行时，不管去哪都会先去看看遗迹，找找当地的博物馆。查紫贤喜欢出土文献，他通过摹写出土竹简辨认和学习字形，感受古文字的书写状态。在他身边，不少考古专业或古文字专业的同学，还自己制作竹简：买来竹篾条，刷上胶矾水，晾干之后就可以用毛笔在上面抄写古文字，或是写上祝福语，在一些学术论坛或是其他同好交流场合中，作为礼物送给他人。

陕西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大三学生林儒煦自幼与古籍结缘。从记事以来，母亲便带着他到古书学习班学习，念诵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等，上小学后开始背诵“四书”。进入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和研读，他尝试与古人产生“共情”，设想古人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些文字。“我并不把它们当作是应该被奉为主臬的存在；我觉得应该有更现代的态度，不要盲从，而是去芜存菁。”

作为一名文科生，他坦言，上高中后有不少次怀疑过自己对社会的价值，“当我学习本专业之后，我才发觉，大众认识到的中国古代文化只是冰山一角，很多东西还有待发掘，而我们正是发掘这批‘隐藏财富’的人。对古人的认识越深刻，反思就会越多，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会更深，也会更自信”。

在专业学习中，林儒煦和同学们必修一门“古籍的数字化整理”，学习OCR（光学字符识别）、自动校准图像、识别重复段落等计算机功能的基本原理，以及用大模型写代码实现前述功能。他表示，文科生学习计算机有些困难，但数字工具可以减少重复劳动，提高整理古籍的效率，“我认为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学习文献学的黄金时代”。

当前，一个由高校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创建的古籍App“识典古籍”，已完成万部古籍的数字化工程，所有资源免费向社会开放。孙路遥是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《四部丛刊》精校项目审核团队成员之一，参与了该App部分古籍上架审核工作。

在她看来，古籍数字化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纸本难获得、文本查找慢的问题，极大缩短了阅读者与研究者前期的“工具性工作”，让他们得以将时间尽可能投入挖掘文本内涵、寻找结构性贯通的“思想性工作”。

“府厅州总图”“县分图”三级，比例尺从“百里程”到“十里方”，这是清代官方测绘的典范。每幅分图都附“图说”，记录疆域四至人口、赋税，堪称“清代云南百科全书”。

书中避免了晦涩的专业术语，转而以“故事化”叙述激活古地图。例如，讲述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时，作者不仅介绍其“首次实测穆穆朗玛峰”“验证地球圆说”的科学成就，更还原了测绘背后的细节。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，传教士安多等人先在北京周边试测，康熙帝将结果与旧图对比，发现新图更精确，才敢展开全国测绘；测绘队用“三角测量法”翻山越岭，在西藏最早发现并测绘珠穆朗玛峰，比印度测量局早135年。这些细节让地图不再是“死物”，而是一群用脚步、仪器与智慧写就的“流动的历史”。

书中特别关注古地图对当下的启示。例如，《郑和航海图》记录了30余国的航线，标注了“满刺加”（马六甲）“古里”（卡利卡特）等地名，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高度重合；《乾隆十三排图》以经纬度网格标注新疆，与今天的“国家版图意识”一脉相承；《五岳真形图》的符号被现代设计师借鉴，成为“中国风”文创的灵感来源。古地图不仅属于过去，更连接着现在与未来。

从战国铜版上的“兆域”到清代绢图中的“天下”，从“计里画方”的传统到经纬度实测的科学，《天地之间：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》以舆图为线，串起了一部“看得见的中国史”。这些被岁月磨洗的古地图，不再是“故纸堆”里的旧物，而是会说话的“历史证人”——它们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怀，也告诉我们：中华文明的延续，不仅在于文字的传承，更在于对“空间”的认知与守护。

（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舆图组组长，研究馆员）

未竟之作的抗战启示录

茅盾曾计划将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写成三部曲，意图完整展现从“五四”前夕到大革命失败这近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和历史洪流。然而，战乱频仍，迁徙不定，他最终只完成了第一部。

小说的“未完成性”，在遗憾的表象之下，却意外地成为其对抗战精神一种独特的诠释。现存文本戛然而止于青年群体深陷精神苦闷的十字路口，钱良材在治水失败后独坐荒丘、面对夕阳的孤独背影，仿佛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定格。这是个体理想受挫的迷茫，更是整个民族在时代困境中求索而得其路的缩影。

这份“断臂维纳斯”之憾，以其不完整性，凸显了抗战的长期性、复杂性、艰巨性。它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启示，民族的救赎与新生，绝非毕其功于一役的快速战，而是一场充满曲折、反复、牺牲和接力奋斗的“精神长征”。文学的“未完成”，预示着民族精神“长征”的永续与永恒。

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以其深邃的艺术世界，封存了那个苦难与抗争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跋涉与灵魂拷问。那由真正“文心”浇灌的、象征民族新生与希望的“二月花”，在精神的沃土上迎来春天。
（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）



□ 姚 明

1942年深秋，抗战烽火炽烈，山河破碎之际，一代文学巨匠茅盾辗转避居西南后方方的桂林。身居仅容一床一桌的逼仄斗室，茅盾的目光却穿透弥漫的硝烟，沉潜至“五四”前后中国社会那场深刻的精神嬗变。正是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里，他提笔写就了长篇小说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。

书名脱胎于晚唐诗人杜牧《山行》中的名句，却将“于”易为“似”。这一字之改，暗指大革命失败后那些在革命低潮中形似“二月花”般绚烂、实则是“霜叶”的幻象；象征着尽管历经霜寒、看似凋零，但真正的革命力量终将如寒冬后的春天般迎来新生，其“红”虽似霜叶，本质却指向必然来临的历史曙光。

抗战语境下的创作突围与“迂回”之智

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旋

茅盾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：写抗战，为什么要写“五四”

即沦陷。茅盾自香港脱险，一路风尘仆仆抵达桂林。彼时的桂林，因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，汇聚了巴金、田汉、柳亚子等大批流亡的进步文化人，一时文星璀璨，刊物林立，被誉为“抗战文化城”。

然而，表面的繁荣之下，暗流涌动，国民党当局不断加强文化审查和思想钳制。正是在这种严苛环境下，茅盾等作家被迫寻找“迂回”之路，将现实关怀投射到历史帷幕之后，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正是这一“迂回”策略的杰出实践。

小说将视角回溯至“五四运动”前夕的江南水乡县城。在这个看似宁静实则暗流汹涌的封闭世界里，新兴民族资本家王伯申雄心勃勃，试图创办轮船公司推动“实业救国”，却遭到以赵守义为代表的地方封建乡绅势力的顽固阻挠。双方围绕善堂公款、地方公益等展开激烈博弈，其本质是新旧两种社会力量、两种发展道路的尖锐冲突。

与此同时，小说着力描绘了以张恂如、钱良材、黄和光、张婉卿小姐等为代表的知识青年群体。他们在新旧思潮激荡的夹缝

中，面对封建家庭桎梏、包办婚姻枷锁、理想与现实落差时的精神苦闷、彷徨挣扎与艰难求索，共同构成了一幅“五四”前夜青年一代的众生相。

茅盾精心构筑的这个历史时空，并非对现实的逃避，恰恰相反，它以一种高度艺术化的“历史镜像”，映照着20世纪40年代的残酷现实。

钱良材心怀改良农村的志向，张恂如则深陷旧式婚姻泥潭而无力自拔，青年群体的“未红之叶”状态跃然纸上。青年大多处于觉醒的初期，思想敏锐却行动乏力，情感丰富却找不到出路。这种“未完成”的精神状态，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艰苦岁月里，具有强烈的现实警醒意义，民族的新生需要更彻底的觉悟和更坚韧的行动力。

文化抗战的美学实践与象征世界

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对抗战精神更深层次的贡献，在于其对中国文学“民族形式”的卓越探索与实践。毛泽东在《延安文艺座



茅盾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版本。

作者供图

谈会上的讲话》明确提出了“为人民群众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”的文艺方向。茅盾对此有着高度的自觉，他有意在这部小说中进行实践，并在结构与美学上自觉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巅峰《红楼梦》的神韵。

小说采用多线索交织的网状结构，以张府、黄府、钱府等几个江南士绅家族的日常生活空间为叙事核心。通过家族间的联姻、社交、经济往来，织就了一张精密的社会关系网络。这种结构不仅真实再现了传